



郑和下西洋·新航路开辟·明清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彭明瀚 (江西省博物馆)

古代景德镇瓷器,不仅满足省内、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大量向海外输出,受到各国人民的广泛欢迎。从宋代开始,景德镇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和新航路开辟之后,海外交通更加兴盛,海洋贸易更加拓展,景德镇瓷器对外贸易随之大幅增长,输出范围从亚洲扩大到欧洲、美洲,不断输往世界各国,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中国瓷器市场。

一、郑和七下西洋

明朝建立后,经过太祖30多年的苦心经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了推动和发展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抱负,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29年间,明政府派遣郑和率领由200艘宝船、27000多人组成的船队七次下西洋。郑和组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远洋船队,船员众多,建制完备,船舶种类齐全,编队严密,通讯便捷,掌握了以“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的天文观测定位技术和过洋牵星导航技术,凭借对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季风规律的正确认识和熟练运用,在十月至次年二月的冬季,从国内启航,乘东北季风扬帆沿海岸南航;五至八月的夏季,乘西南季风举帆沿海岸北航回国。郑和七下西洋,取得了巨大成功。

郑和七下西洋,是明初外交活动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不仅使所到各国之间的睦邻关系得到了加强,也使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南端和非洲东海岸地区的一些国家增进了对明朝的了解和认识,与明朝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大大提高了明朝海外的威望和影响,从而迎来了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为辉煌的时代。正如前后四次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所言:“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

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际天所覆,极地所载,莫不咸归于德化之中;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罔不悉归于涵养之内。”“太宗文皇帝继圣守成,代天理物,声教扬溢乎四海,仁化溥洽于万方,制作谋谟,腾今迈古。永乐之初,敕遣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盛典。舆图开拓,万善成臻,未有至于此也。”郑和下西洋,为明朝中国商人到这些地区进行商业活动打下了很好基础。

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推动了明代造船技术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飞跃,为明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技术基础。郑和的宝船长44.4丈,宽18丈,立九桅,张12帆,排水量14800吨,载重量7000吨,是中国有史以来也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帆船,是明初造船技术的集中体现。郑和下西洋期间,江南地区仅见于记载的新造或改造海船多达2700艘,短时间内巨大的需求和郑和的航海实践,对当时的造船技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郑和的船队活动范围极为辽阔,在长期的航行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宋元以来的海上航路,形成了多点交叉的综合性航路网。《郑和航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标出了沿途的碍航物、山峰、岛屿、浅滩、礁岩、险狭水道、水深、底质、港口标志以及正确的定位与航行方法,为明代中国船队扬帆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海域提供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航路指南。随郑和船队航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他们所著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中,对船队所访问国家的位置、气候、土壤、居民、生产、土特产品、风俗习惯、货币及贸易情况作了描述,增进了明朝人对这些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为宣德以后中国商人到这些地区进行商业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郑和七下西洋,剿灭了海中蛮寇,肃清了海道

障碍,“诸番振服”,“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以安业”,保证了西洋与中国之间海上交通安全,为此后明朝与西洋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郑和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远达波斯湾,行程10余万里,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和东非的满刺加(今马六甲)、古里(今科泽科德)等37个国家和地区,出色地完成了朝贡与贸易任务。郑和的船队开辟了历代海上丝绸之路中航程最长的远洋航路,活动范围非常辽阔,从中国南海之滨,经南海入印度洋,延伸至西亚、东非的广大地区,其西北方向的航路直通波斯湾、阿拉伯海和红海,西南方向的航路,沿东非海岸越过赤道,到达今莫桑比克索法拉港,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贸易空前繁荣^⑪。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刺激下,中国成为新航路开辟以前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贸易强国。明代中期,特别是成化、正德至嘉靖时期,中国民间商队穿梭在过去由阿拉伯人主宰的海上陶瓷之路上,民间贸易发达,瓷器输出随之扩大。当时日本、南洋及印度洋沿岸各地的市场商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他们需要大批中国货,仅依靠明朝政府控制下的“朝贡贸易”是远远不能满足的,因而中国沿海形成若干海商集团,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犯禁下海,冒险从事海外贸易。福建商人“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军器,收买奇货”^⑫,远航到海外,“与番舶夷商货贩方物”^⑬。即使明政府严禁私人从事外贸,“重以充军处死之条,尚犹结党成风,造舡出海,私相贸易”^⑭。浙江海商的船队,每天航行舟山群岛的达“一千二百九十余艘”^⑮。广州附近游鱼洲的私商贸易更为发达,“广东隔海不五百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濠畔街,外省富商,搬瓷器、丝绵、私钱、火药等违禁物,满载而去,满载而还,追星赶月,习以为常,官兵无敢谁何。”^⑯当时既有中国商人私自出洋贩运瓷器,也有外商来中国近海购买瓷器,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带有走私性质的陶瓷贸易依然活跃。当时私人海上贸易范围很大,海商的足迹遍布东西二洋,东起日本,中经菲律宾群岛和印度半岛,到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都有中国海商出没。隆庆初年,明政府采纳右金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许贩东西诸番”,取消海禁。海禁开放后,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自穆庙时除贩夷之律,于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割鯨脰,分市东西路,其捆载珍奇,故异物不

足述,而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其殆天子之南库也”^⑰。繁荣的海上贸易,推动了包括景德镇制瓷业在内的中国手工业飞速发展。

二、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

关于景德镇瓷器外销路线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从瓷器产地景德镇到中国沿海港口的路线,二是从各海港到外销目的地的路线。

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几经变化,在明朝初期,实行海禁政策,只是设立三个市舶司,负责各国与明政府之间以勘合贸易为特征的朝贡贸易,据《明史·食货志》,“洪武初,设于太仓黄渡,寻罢。复设于宁波、泉州、广东。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三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到正德四年(1509年),非朝贡国家也被允许进入广州进行贸易。嘉靖元年(1522年),宁波发生争贡之役,明政府撤销了浙江、福建二市舶司,独存广东市舶司一口对外贸易^⑱,从此形成了广东在对外贸易上一枝独秀的局面。万历年间,受明政府委托,广东三十六行代替市舶司主持对外贸易事务,从此开始了广东官商垄断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对外贸易迅速繁荣,“广东几垄断西南海之航线,西洋海舶常泊广州。”^⑲

清顺治七年(1651年),清政府控制广州。由于政局不稳,尤其是郑氏集团控制了厦门、金门和台湾,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禁海与迁海政策,官方对外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然而,清代前期,国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仍然十分巨大,占领台湾的郑氏集团和控制广东的平南王乘机分别控制闽、粤沿海的贸易,以“走私”的方式与洋人通商,平南王垄断对日贸易,每年出洋的商船在1000艘以上。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的记载,当时和巴达维亚、麻六甲、柔佛等地的走私贸易船只很多,所载瓷器的数量也很大。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并于翌年设立江、浙、闽、粤四海关,负责对外贸易事务,欧洲商人纷纷涌向广州。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当时规定外商船只能停靠黄埔港,不得进入广州城,在黄埔港与十三行之间,有中国驳船往来接送人员与货物。

从明清时期对外贸易港口的变化情况看,景德镇瓷器外销的港口主要有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港口,从景德镇到达上述三省沿海港口的便捷路线大致有三条:

第一条路线是从景德镇出发,经昌江,进入鄱阳湖,再溯信江而上,经陆路进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东海。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如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漳州卫指挥覃庸等私通番国”^②。明代中叶以后私商海外贸易屡禁不止,月港兴起,成为明代中晚期福建最重要港口,“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暹罗、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③。隆庆元年(1567年)准许月港开禁,获得合法地位的月港海外贸易更加繁盛,张燮《东西洋考》所录的月港海外贸易达西、南洋海域的交趾、占城、暹罗、下港、柬埔寨、大泥、旧港、麻六甲、哑齐、彭亨、柔佛、丁机宜、思吉港、文郎马神、迟闷,东洋的吕宋、苏禄、猫里务、沙瑶、呐咩、美洛居、文莱、鸡笼、淡水,以及日本、荷兰。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和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④。明末清初郑氏集团统治厦门、金门和台湾期间,控制了与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贸易,推进了厦门港口的发展。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统计,由我国商船从厦门载运到台湾或巴达维亚,然后再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转运到世界各地的瓷器数量巨大^⑤。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清政府在漳州设闽海关,月港衰落。雍正六年(1728年)闽海关由漳州移至厦门,厦门成为东南沿海最重要的对外贸易集散地,“大小帆墙之集凑,远近贸易之都会也,自担门东渡黑洋至于台湾,上接沙垵,下连南澳,据十闽之要会,通九译之番邦”,“服贾者以贩海



图一 景德镇瓷器至国内沿海港口路线示意图

为利藪,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⑥200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屿头乡北侧碗礁海域发现一艘清康熙时期的沉船,虽

然被盗掘,仍然清理出景德镇青花、五彩瓷器17000多件,这些瓷器也是东南亚、非洲、欧洲各国博物馆中比较常见的器种^⑦,沉船出水中国景德镇瓷器,以实物证明了这条海上陶瓷之路的存在。

第二条可能的路线是经昌江、鄱阳湖、信江至铅山河口镇,由陆路过衢州、金华,再入富春江至宁波港。宁波当时称明州,是中国瓷器向东运销日本、朝鲜的重要港口,明代因倭患实行海禁后,宁波海外的双屿成为江浙沿海走私通番的据点,私商为抗拒禁海,多逃聚双屿,通西南洋、接日本,从事走私贸易。夏燮《明通鉴》卷九五记载:“明初包括来自葡萄牙、日本的海商在内的中外私商集结达万人以上,屡禁不止,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被朱纨捣毁。宁波外海地区,‘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诤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之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⑧。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禁设四口通商,宁波设浙海关,宁波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商船达于东海、南海各国,港市再度繁荣。

从宁波港出发,沿中国近海航行至山东,横过渤海,到达朝鲜西海岸各港口,再沿朝鲜西海岸南行,则可达日本九州^⑨,在九州博多古港出土许多中国古陶瓷,证明文献记载中的这条航线的确存在。“始倭之通中国也,实自辽东,由六朝及今,乃从

南道”^②。所谓南道 就是指从宁波港出发 ,向东航行 横渡东海 沿琉球群岛迂回前进 然后达日本各地^③。“海寇……往者由新罗、百济至辽阳南下 本朝初由大小琉球迂绕福建至浙,近乃发五岛由八山、霍山直对宁波。”^④

第三条可能的路线是经昌江、鄱阳湖、赣江 翻越梅关后进入广东北江水系 ,到达佛山 ,这既是汉代以来至京广铁路开通以前沟通中国南北的交通要道 ,也是直到鸦片战争后景德镇瓷器最为常见的国内水陆联运路线。明代广州是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的朝贡港 ,广州港在很长时间内垄断了西、南洋航路上的朝贡贸易 ,嘉靖二年(1523 年)废除闽、浙市舶司,“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⑤ ,广州港一度成为控制东、西洋朝贡贸易的唯一港口,“广州往诸番,出虎头门,始入大洋分东西二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⑥据《明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六 嘉靖八年(1529 年)“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 ,对于海外商船一律征榷关税放行 ,葡、荷、英等欧洲洋船相继靠泊广州港。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废除海禁 ,在广州、漳州(雍正六年即 1728 年移厦门)、宁波、云台山分别设置粤、闽、浙、江海关 ,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商船交于四省,偏于占城、暹罗、真腊、满刺加、渤泥、荷兰、日本、苏禄、琉球诸国”^⑦。

明中期广州是景德镇瓷器的主要出口港 ,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士曾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访问广州 ,他在《中国志》里记述了当时广州市场出售瓷器的情景,“……瓷器有极粗的,也有极细的;有的瓷器公开售卖是非法的,因为只许官员使用,那是红色和绿色的、涂金的及黄色的。这类瓷器仅少量偷偷地出售……商人的大街是最主要的大街,两侧都有带顶的通道。尽管这样,瓷器的最大市场仍在城门,每个商人都在他的店门挂一块牌子写明他店内出售的货物”^⑧。考虑到广州口岸在明清时期绝大多数时段是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自然这条路线是景德镇瓷器外销最为重要的黄金通道,江西大余的梅关便成为这一通道的转运枢纽。1794 年范·布拉姆率领荷兰使团进京途中,在大庾岭曾目睹众多的中国苦力挑着瓷器担子艰难地翻山,表明瓷器南运的路线到 18 世纪末甚至 19 世纪初仍在使用中^⑨。总之,这一线路运输瓷器的记录广泛见于中外史籍中,有的甚至以绘图方式,反映当时梅关一带苦力挑运瓷器从江西进入广东的情况,最为形象的要数现在由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套 50

幅的瓷器烧造图。这套 50 幅水彩画册,每幅均纵 41、横 31 厘米,连在一起差不多有 20 米长,描绘了瓷器从采集原材料到装运出洋的整个制作过程。图画没有完全按照《陶冶图说》和《景德镇陶录》的绘制内容来进行绘制,省略了其中一些广州外销画家不熟悉的内容,在某些细节上则绘制得更加丰富细致,还添补绘制了与瓷器贸易和广州口岸相关的情景。其中图册之三十九至五十,表现的是从瓷器生产地到瓷器外销口岸广州的整个运输贸易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口岸城市与国内外市场联系的生动画面。图册之三十九描绘的是景德镇瓷器行的情景,瓷器商人在柜台后面仔细地盘算着,图册之四十描绘的则是交易完成后,工人们从瓷器行把瓷器搬运出来的情景,接下来图册四十一至四十二,描绘了瓷器从景德镇通过水陆联运抵达佛山瓷器行的过程,图册四十四至四十六描绘的是瓷器从佛山经北江水陆运抵广州口岸。以广州口岸为出口地的景德镇瓷器,利用赣江和北江水路进行运输,先从景德镇起运,经由昌江、鄱阳湖、赣江,经过南昌、樟树、吉安、赣州等地,到达大余。瓷器在大余改由陆运,越过梅岭,到达广东北部的南雄,在南雄再度上船,经由北江水运到佛山、广州。在整个运输过程中要经过几个关口,清政府在这些地方设关收税,包括设在赣县的赣关,以及广东省韶州的韶关等,再经由英德县、西江驿,到达南海县佛山镇,进入广州的西关地区。因此画面上除了衣衫褴褛的运输工人在辛勤劳作外,还有一些衣着光鲜悠闲自在的人,他们应该就是守关收税的官员。图册四十七、四十八则描绘了西洋商人到瓷器铺选购瓷器的情景,图册四十九、五十描绘了西洋商人选购好的瓷器被装上



图二 梅关古驿道,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经由这里被贩运到广州,转口至世界各地

船板船,从十三行区运到黄埔港,在这里装上准备启程返航的悬挂荷兰国旗的西洋船只,完成瓷器贸易。这套图册完整再现了“景德镇瓷器工厂—瓷器商人—广州铺商—西洋商人”的瓷器买卖全过程,其间可以看到工人们辛勤的劳作、瓷器商人的精打细算,以及西洋商人的贸易活动,也可以看到清政府从产地到出口地对瓷器贸易的控制和管理,是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瓷器生产贸易过程的极佳图像资料^⑧。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以澳门为中心,通过数条国际航线将中国瓷器转运至欧亚各地,中国瓷器对外贸易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的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贸易循环网。主要有3条航线组成:广州—澳门—印度—欧洲航线,这条航线可分为两段,澳门至印度一段航线途经马六甲、古里、科钦、果阿等地,是中国与东南洋、印度洋一直有往来的“西洋航路”,而由果阿经好望角至欧洲的航路则是新航路开辟的直接产物。1990~1992年,越南头顿省沿海发掘的康熙年间中国沉船,出水景德镇瓷器6万件(套)。1998~1999年,越南金瓯省沿海发掘的雍正年间中国沉船,出水中国景德镇瓷器约5万件^⑨,该船出水地点正好位于中国瓷器西运欧洲的航线上,以实物证明了这条航线的存在。第二条为广州—澳门—日本长崎航线。在中日贸易航线上,1550~1638年的90年中,葡萄牙船队共航行四、五十次,每次起码有五、六艘船一起航行。第三条为广州—澳门—马尼拉—美洲、拉丁美洲—欧洲航线,这条航线可分为两段,中国沿海港口直航菲律宾群岛各港口,是明代新开辟的中菲航线,1571年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开辟了一条由马尼拉横渡太平洋通往墨西哥阿卡普尔、再延伸到欧洲的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中国至菲律宾段多数为中国人往来贸易;菲律宾至欧洲段航行的是西班牙大帆船,故人们称此种大帆船进行的贸易为大帆船贸易。在1565~1815年中,西班牙殖民政府每年都派遣1~4艘大帆船,来往于墨西哥与马尼拉之间^⑩。澳门—果阿—里斯本航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条,通过这条航线,大量瓷器源源不断地运往里斯本。

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贩运中国瓷器,不同时期各有相对稳定的发货地、中转地以及往返航线。贩运的方式主要有直接贩运和间接贩运两种。直接贩运即在中国的澳门、台湾、广州、厦门等港口装船,运往其在东南亚的基地再运回欧

洲,或运往东南亚各地销售,澳门和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分别成为葡萄牙和荷兰人直接与中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地。间接贩运即由中国船或其他从事亚洲区间贸易的船只将中国瓷器运至马尼拉、巴达维亚、巨港、万丹等南中国海以外的亚洲主要集散地,西班牙人利用马尼拉殖民地东运西属美洲,或经由那里转运欧洲,葡、荷、英、法等国则利用巴达维亚等其他集散地装运到印度苏拉特、科罗曼德尔、卡利卡特、果阿各港口。远洋航海与殖民时代,印度半岛在欧洲和远东贸易中的地位,恰如内海与河道贸易时代威尼斯在欧亚贸易圈中扮演的角色。原因在于明代以后,随着中国船队的多次下西洋,中、印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中国的外销商品在南亚可谓一应俱全,吸引了西亚和非洲以远的客商前来采购。加上印度又位居欧洲和中国远洋贸易航线的中部,中转站的地位尤其突出。印度的沿海港市中,苏拉特和科罗曼德尔是中国瓷器西传的两个最重要的中转站,中国瓷器经由这里分转波斯、穆哈等地,或西行绕经好望角运抵欧洲,或按传统的途径运销印度腹地。16世纪后半期,香料和中国瓷器成为欧洲人在印度贩运的大宗商品,以至于在欧洲形成这样的观念:“瓷器来自印度,但由中国制造”^⑪。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因英国商人“洪仁辉事件”再度关闭了闽、浙、江海关,“嗣后口岸定于广东”,“止许在广东收泊贸易”^⑫。广州一口通商后,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英国、法国分别于1685年、1698年在广州设立商馆。随后,荷兰、丹麦、瑞典等国家也于雍正年间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经营瓷器、丝织品、茶叶等中国商品。广州以环中国海第一港市的地位长期垄断西、南洋与亚欧航路贸易,直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各国商馆均设在广州西城外郊区的河边,紧邻十三行,以便双方商贸活动顺利展开。众多外国商馆的设立,为中国瓷器外销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于每年冬季从欧洲启航,利用季风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绕过好望角后再向东航行,大约于第二年农历十月以前抵达中国广州,停泊在黄埔古港。在广州期间,欧洲商人可以进驻洋行附近的夷馆,那里有营业区、货栈区和生活区,等待十三行商人为其销售所带货物,并配齐将要运回欧洲的中国货,第三年三月前后,从广州启航,七、八月间抵达欧洲,整个航程约耗时一年半,航行60000多公里。

三、景德镇瓷器外销欧美

明朝前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格管理对外贸易,元代发达的对外瓷器贸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即使是这样,中国瓷器的输出也没有停止过。郑和七下西洋,继承了宋元以来不断发展、因洪武海禁暂时走下坡路的中国对外贸易,使“海上丝绸之路”再度活跃,虽然郑和每次远航携带瓷器的数量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但是从随同郑和出航的费信、马欢所著《星槎胜览》、《云涯胜览》上看,当时郑和的船队到达哪里,瓷器就传播到哪里,景德镇青白瓷与青花瓷很受欢迎。《云涯胜览》特别提到“爪哇国人最喜欢中国青花瓷器”。当时的占城、锡兰、祖法儿等地,人们都争购中国瓷器。《星槎胜览》记载广泛交易瓷器的地方就更多。为了适应国外市场对中国瓷器和其他物品需求的形势,清政府解除海禁后,一方面允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⑩,另一方面,又允许外国人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为中国瓷器外销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我国大规模瓷器输出,主要是通过正常的民间贸易来进行。新航路开辟之后,中国瓷器外销的地区由亚洲、北非迅速扩展到欧洲、美洲成为中国瓷器最大的海外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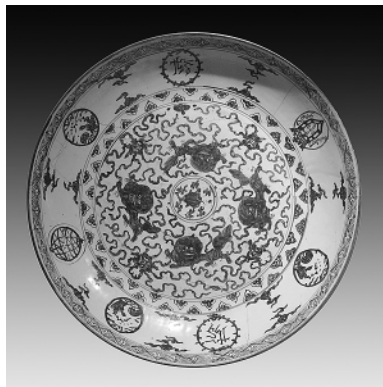
13世纪末,在中国游历了十几年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回欧洲时从中国带回了一些瓷器。马可·波罗对中国瓷器的生动描述使欧洲人了解到中国是瓷器的故乡,最美丽的瓷器出自中国,对美丽的东方事物充满了向往^⑪。中国瓷器一经进入欧洲市场,即刻被视为珍宝,有些瓷器被陈设在金质、银质器座上,为人们珍爱、收藏,其价值可与黄金相比,被称为“白色的金子”。王公显贵对中国瓷器如痴如醉,喜爱中国瓷器,更为神秘的中国文化所吸引、所感染,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器极大地影响了欧洲人的生活,人们为能拥有一件中国瓷器而感到骄傲和荣幸,一些人也靠中国瓷器贸易而一夜暴富,乃至在当时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风”。

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和东方之间有奥斯曼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和印度莫卧儿王朝3个强大的伊斯兰国家,阻隔了两地的陆上交通。15世纪初葡萄牙人就开始沿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寻找通往富庶而又神秘东方的航道。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沿非洲西海岸南行,1498年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到达印度卡里库特港(Culicat,明代称为古

里),并在返航时带回了大量东方货物,它们在欧洲出售后获得的利润,据说超过其航行费用的60倍^⑫,这批货物中就包括达·伽马在加尔各答(Calcutta)购买的瓷器,还有当地苏丹赠给他的6盆瓷器和6个瓷瓶,回国后,达·伽马把其中一部分瓷器送给了唐·曼努埃尔国王,立即引起了里斯本宫廷的兴趣^⑬。因此有学者认为,欧洲人真正使用中国瓷器是从达·伽马的船队返回里斯本开始的^⑭。葡萄牙人首次直接从中国大量贩运瓷器到欧洲,但将其推向高潮的是以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接着法国在1728年,荷兰在1729年,丹麦在1731年,瑞典在1732年也相继设立了贸易站,直接从中国贩运瓷器,将中欧瓷器贸易推向新的高潮^⑮。

1. 葡萄牙

中国瓷器是葡萄牙东方贸易的重要商品,因此葡萄牙人称这条商路为瓷器之路或香料之路、丝绸之路。但是在1514年以前,由于没有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葡萄牙人只能辗转从其他亚洲国家得到少量中国瓷器,瓷器贸易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受到限制。1514年,葡萄牙人到达广州附近的屯门岛(今深圳南头附近),购买了一批瓷器^⑯。这是葡萄牙殖民者第一次来到中国,不仅意味着欧洲与中国直接贸易关系的开始,也意味着中西瓷器贸易的开端,开辟了通向东方的新航路,控制了中国对欧洲大陆贸易的大部分,成为荷兰占领台湾以前百年间中欧瓷器贸易的主体。为了使中国瓷器更符合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葡萄牙人采用订货的方式,向中国商人提出款式、花色等方面的要求,在下一个贸易季节取货并根据市场变化和需求再提出新的订货要求。1528年,若热卡布拉尔(Jorge Cabral)从马六甲致函国王:“我向一个来到此地的中国船长,为殿下定制了几件(瓷器),他把瓷器带



图三 明代后期景德镇窑青花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盘内心绘有葡萄牙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皇家军队的徽标,周围衬以中国式花卉,应该是葡萄牙定制的产品

来了,可是,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当我回去以后,殿下就知道是什么样了。由此,我知道中国人在满刺加很守信用,因为如果向他们定货,就会带货回来。”^{④8}1522年,葡萄牙国王宣布从印度返程的商船可装运占总船货1/3的瓷器^{④9},当年中葡贸易中,瓷器正好占贸易总额的1/3^{⑤0}。

葡萄牙人于1553年开始租借澳门,1557年获准在澳门上岸筑屋,获得了对华贸易的一个重要基地,并逐步获准经营澳门港口的海上贸易。此后,随着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澳门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欧洲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贸易与殖民据点,同时也是欧洲各国进入中国的门户与跳板。从世界范围看,中国贸易只是欧洲整个东方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一环。葡萄牙人控制的中国贸易,包括从澳门经印度果阿到达欧洲的航线,也包括从澳门到日本、东南亚,以及从澳门经菲律宾马尼拉到达西属墨西哥的其他航线,从此,澳门成了中国通往世界各国的海运中心^{⑤1}。从在澳门建立贸易据点到17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垄断对东方的贸易,欧洲人来华,必须获得葡萄牙国王批准,搭乘葡萄牙商船从里斯本起航。里斯本成为欧洲的瓷器贸易中心,出现了许多专门经营中国瓷器的商店,1580年,仅“商人新街”上便有6家中国瓷器店。一份1620年的文档中,记录有17家中国瓷器商,运来大量瓷器,不少船只载运两三千套,每套20件^{⑤2}。最吸引人的是以销售中国瓷器著名的格尔明(Germain)街,包括荷兰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都要从里斯本转运瓷器到本国销售。尽管当年葡萄牙人前往东方主要是寻找香料与丝绸,最初并不了解瓷器的价值,但作为压舱物的瓷器,却以其晶莹的质地、美丽的色彩引起上流社会关注,人们开始争相追逐,欧洲王室以拥有中国瓷器作为炫耀海权的手段,贵族则以其夸耀财富,而烧有个人化纹章的瓷器更是显赫社会地位的象征,一时间,里斯本成为传播中国瓷器文化的中心^{⑤3}。

在当时,丝绸贸易的利润约150%,瓷器贸易的利润约100%~200%^{⑤4}。丰厚的利润使得欧洲其他国家相继加入到与中国的贸易中来,引发了对葡萄牙垄断权的挑战和相互之间的贸易竞争。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败,标志着葡萄牙、西班牙垄断世界贸易的格局开始动摇,英国和荷兰乘机开始绕道好望角,试图建立自己的直通航道,打破葡萄牙、西班牙对亚洲贸易的垄断。英国、荷兰

等8个国家相继成立由政府授权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例如,1600年成立英国东印度公司,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1616年成立丹麦东印度公司,1664年成立法国东印度公司,1731年成立瑞典东印度公司,等等,其中以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最为重要,荷兰东印度公司兴盛于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称雄于18世纪。从17世纪起,瓷器就成为各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在中国采购的大宗商品,欧洲因此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市场。据最保守的估计,在18世纪一百年中,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在6000万件以上^{⑤5}。

2. 荷兰

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商人或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中国瓷器,再运销东南亚、南亚和欧洲,买不到的时候就抢劫葡萄牙商船,荷兰人最初得到的2批中国瓷器都是通过抢劫葡萄牙商船获得的。1602年3月,荷兰人在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附近海域捕获葡萄牙圣·亚戈(San Jago)大帆船,将28筐瓷盘、瓷碟,14筐瓷碗作为战利品带到米德尔堡;1604年,海军司令贾柯布·范希姆期柯克(Jacob van Heemskerck)率兵在马六甲海峡捕获葡萄牙圣·凯瑟琳娜号(San Catherina),得到约10万件、重60吨的瓷器^{⑤6}。这两批中国瓷器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后,引起了轰动,促使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重视与中国的瓷器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最盛时拥有6000只船^{⑤7}。



图四 尼尔活夫《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远征》铜版画,描绘了17世纪中叶荷兰海船停泊在广州的情景

在中荷瓷器贸易中,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或各商会根据自己的存货情况、荷兰瓷器商的订单以及荷兰或欧洲市场的供需状况决定欲购瓷器的品种与数量,然后指示公司驻巴达维亚行政当局及属下商务大班们具体执行。荷兰商人根据公司的指

示向中国瓷器商订购所需瓷器,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采取签订销售合同、预付定金的方式进行交易。

在贸易的早期,荷兰人还提供不出自己所需的瓷器样品,所以,1624年公司曾向中国商人索取各种式样的瓷器样品,为了便于外商选货,广州方面特制了一批样盘,盘的边框四等份,每1/4的地方各施以不同的彩饰、花纹,以供外商选定。1731年12月17日,阿姆斯特丹商会发给巴城当局的订单为:“购买价值大约五万至六万荷盾的各式瓷器,其中绝大部分为青彩、蓝底描金、素白与红底描金,所有瓷器均要造型漂亮。”1733年,泽兰商会不仅将一份详细开列品种、颜色、规格、数量要求的购买瓷器清单送往广州,而且还随清单附上一箱编上号码的样品。然而,为了使中国瓷器能够在荷兰及欧洲畅销,公司很快就主动向中国商人提供样品,从1736年开始,荷兰买家将瓷器订单交给工厂,下一年交货,变成常规做法,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往中国成百上千的瓷器画样^③。

1635年10月,台湾长官汉斯·普特曼斯向福建商人提供了一批木质的碟、碗、瓶、罐、壶、杯、坛子、盘、脸盆等样品,上面绘有各种形态的中国人物。福建商人见到样品后即声称能够仿制,并保证在下次季风时节将货物运抵交付。1639年,台湾的荷人将一批自荷兰送来的木模交给福建商人Jousit,要求订制2500件上等的果碟、脸盆、烛台、茶壶、芥末罐、酒壶、坛子等瓷器,并在合同上规定了各式瓷器的具体质量要求。同时,荷兰人还要中国翻译Cambingh担保,Jousit交货时应一并归还这批木模^④。

荷兰人订购的瓷器,根据图案描绘的题材大致可分为纹章、人物(希腊罗马神话、圣经故事、欧洲风俗小品等)、船舶和花卉四类,都是欧洲人喜闻乐见的绘画形式,种类则大多是符合欧洲人饮食习惯的西餐具。经过荷兰人重新设计、改造后的中国瓷器,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所接受,瓷器作为餐具的优点渐渐为欧洲人所了解,成为最受欢迎的餐具,走入了欧洲民众的日常生活^⑤。

随着欧洲市场对中国瓷器需求不断增加,荷兰东印度公司加大贩运量,1635年,运回各种瓷器221579件,1636年上升到487911件,1637年为399352件^⑥。据戴维斯(D·W·Davies)估计,在17世纪,荷兰共贩运1500多万件中国瓷器到欧洲以及各个东方国家,他感慨地说:“世界对瓷器的要求是

如此之多,以至于最后都充满了中国的杯和茶壶”^⑦。从1728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3~6艘贸易船到广州,直接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每艘贸易船一般装载瓷器20~25万件,因而每年运到荷兰的瓷器约60~150万件^⑧。据A·乔克先生统计,1730~178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装运并拍卖的瓷器约4250万件,至18世纪80年代末,仅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瓷器超过6000万件。按通常的比例,除去约1/4的日本瓷、北部湾瓷等,中国瓷器应不少于4500万件^⑨。

由于荷兰远洋航船多,贩运规模大,加之国际商港数量多,成为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腹地的转运中心,除荷兰本国船只外,欧洲其他国家的货船也常在这里卸货,当时欧洲著名的报刊《欧洲贸易》和《阿姆斯特丹报》经常刊登满载瓷器和其他中国商品的商船抵达阿姆斯特丹的通告。阿姆斯特丹、米德尔堡、鹿特丹、代尔夫特、霍恩、恩克霍伊曾等许多荷兰城市都拍卖过瓷器。荷兰的瓷器拍卖有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泽兰议院的《拍卖汇编》(共7卷),汇总了泽兰40多年时间里卖出的全部商品和每一批货物价格及买主情况。18世纪20年代以后,每次拍卖都有30名甚至更多的买主在这里竞拍成交,登录在册的大瓷商或商行先后有比尤克拉、黑兹博梅商行以及西特斯和卡托商行等,他们一次性成交的瓷器均达数万件,有时甚至在10万件以上。这一兴旺的局面因1780~1784年的第四次英荷战争而受到严重影响,中荷瓷器贸易开始衰退,1795年法国入侵荷兰,18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被解散,持续了近200年的中荷瓷器贸易结束。

3. 英国

英国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从事东方贸易。在17~18世纪前期,亚洲贸易基本上被荷兰垄断,英国人在波斯湾贡布朗设立贸易站,从事转口贸易,这一时期英国人称中国瓷器为“贡布朗货”。1699年,英国商船麦士里非尔德号抵达广州,运回一批中国瓷器。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常驻商馆,正式从事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每年派船到中国贸易,从此,英国人称中国瓷器为“中国货”。18世纪30年代开始,在广州的黄埔港和珠江内停泊的外国商船以英国船居多,1753年,驶入广州的外国商船约有27艘,其中10艘是英国的。18世纪中后期,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国力昌盛,来华贸易的



图五 清代粉彩英格兰纹章盘

英国商船数量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主导欧洲经营中国瓷器的国家，中欧贸易进入英国人的时代，亚洲贸易中心也从巴达维亚转移到加尔各答^⑤。到1790年，

驶入广州的商船为56艘，其中英国有46艘，占82%。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货运量最大的远航商船队。同时，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业务中，各国的商人们也都统一使用英语^⑥。中国瓷器被大量运到英国，再从英国转运到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属北美东海岸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甚至出口到荷兰^⑦。据初步统计，1720~1770年间有2500~3000万件瓷器输入英国，成为中、英瓷器贸易的黄金时期^⑧。1791年，英国政府下令停止进口中国瓷器，次年春天，最后一批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名义进口的中国瓷器输入英国，从此，成批进口中国瓷器的历史结束^⑨。

这些瓷器大多运到伦敦出售，大约在1609年，伦敦出现了第一家瓷器专门商店，1774年，瓷器商店增加至52家，同时还接受对瓷器有特别要求的订货，店主被称为“瓷器人”^⑩。英国牛津著名瓷器商人Peers(1703~1781)所设计或指定的一些特定式样的午餐具，于1731年由英国商船广东商人号从广州起航驶往印度，再转运到伦敦。如今，英国博物馆中还珍藏着Peers先生在1731年12月19日于广州签署的订购中国瓷器发货单^⑪。

4. 瑞典

瑞典是中国瓷器又一个重要市场，尤其是当年的瑞典皇后乌尔利卡对来自中国的物品格外喜爱并精心收藏。她不但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后岛上建造了一个中国宫，还在她的中国宫中摆满了中国的漆器、屏风、家具、瓷器以及丝绸制品^⑫。1731年，瑞典国会批准成立瑞典东印度公司，公司共有37艘商船，至1813年公司破产，共进行了132次航行，其中有127次航行的目的地是中国广州。1732年，费里德克·雷克斯·苏斯亚号首航，1733年8月返航哥德堡，运回中国瓷器43万件。1746年费雷登号



图六 外酱釉内青花山水花卉纹小碗，瑞典海事博物馆藏。1905年从1745年沉没的哥德堡号出水。

运回中国瓷器239823件(套)：149668套茶杯、碟，9862套咖啡具，129套餐具，239套黄油盒、盘，1840个糖碗，13160个折腰碗，23036个甜品盘，41140个饭碗，387个大碗，8个特大碗，考虑到一套瓷器往往包括若干件，有时甚至可以达到250件，因而每次运回的中国瓷器数量是巨大的。中国瓷器是瑞典东印度公司最为主要的商品，据现存记录估算，公司从中国运回了大约5000万件瓷器^⑬。

5. 法国

法国经营中国瓷器贸易比荷、英各国要晚，但对瓷器艺术要求很高，特别喜爱色彩艳丽、富丽堂皇的彩瓷和青花瓷。法国于1664年在国王路易十四支持下组建东印度公司，但公司首航中国则是1698年抵达广州的安菲特利特号，从中国运回了167箱瓷器，包括咖啡壶、坛、大口水罐、碟、盆、盘、茶壶、瓶、酒杯、茶叶罐、壁炉外层装饰、胡须盘等各种生活用瓷^⑭，共计有68万件^⑮。精湛的中国陶瓷



图七 德国的瓷宫，为欧洲各国所仿效。法国的瓷宫，为欧洲各国所仿效。十七世纪起源于



图八 景德镇瓷器外销海运路线示意图

进入法国,很快渗入法国人文化生活各个领域。人们对莹洁光润、纤巧精美的中国陶瓷赞叹不已、视为珍奇,陈设、收藏中国瓷器成为时尚,宫廷、王室贵族们更是把对中国瓷器的拥有量视为地位、财富的象征。在17世纪,任何一个别墅或宫殿中若无中国瓷器点缀,便不可能被看作完美^⑥。路易十四收藏中国细瓷超过1000件,他还修建了一座富有中国情调的特里阿农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瓷宫”来收藏这些珍宝。路易十五时期,更是对中国瓷器着迷,国王下令用瓷器取代银器作为皇宫日用品,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瓷器在法国的普及。当时法国是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是生活时尚的发源地,此风从法国席卷整个欧洲,各国竞相建立所谓中国宫或中国屋子来存放中国瓷器和其他中国用品。当时的哲学家格芮姆指出:“有一个时期,每家的桌上,都陈列着中国物品,我们许多器具的样式、许多东西,都是以中国趣味为标准,没有了这些东西来装饰就感觉社会地位被降低了。”^⑦

6. 美洲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拉美各国先后沦为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地。中国瓷器也随着欧洲殖民者传播到拉美,最初是葡萄牙、西班牙商人,后来是荷兰等国的商人贩运中国瓷器转销拉美各地。1500年,葡萄牙人就从印度洋航线运载中国瓷器,按照澳门(中国)—果阿(印度)—里斯本(葡萄牙)—巴西的航线,销售中国瓷器获取巨额利润。

1522年,麦哲伦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完成环

球航行。1529年,西班牙与葡萄牙在西班牙萨拉哥莎(Zaragoza)签订《萨拉哥莎》条约,双方约定以东经133.23度为分界线,对世界进行第一次大划分,西班牙向东、葡萄牙向西进行殖民扩张。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占领菲律宾宿务岛,在菲律宾建立第一个西班牙殖民据点,同年,开辟了从菲律宾经太平洋到达墨西哥阿卡普尔港的太平洋航线。1571年西班牙占领马尼拉,确立了在菲律宾贸易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人在美洲攫取了从墨西哥到南美洲的广大地区,建立起地跨南北美洲并远到亚洲的海外殖民帝国。西班牙人以马尼拉港为贸易中心,同中国进行间接贸易,即由葡萄牙或中国商人把中国瓷器及其他商品运到马尼拉,西班牙人再将它们装上驶向西属墨西哥、大西洋到达本土。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亚洲大致以菲律宾为分界线,开辟了与中国的贸易航道,即“澳门—果阿—里斯本—巴西”和“塞维尔—阿卡普尔—马尼拉”。中国瓷器是当时贸易中重要的商品,1573年首航美洲的马尼拉大帆船,所载货物中包括中国瓷器2.23万件“优质的镀金瓷器和其他瓷器”,从1575年至1815年250年间,每年驶往马尼拉的中国帆船数通常在20~60艘之间^⑧。从此,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从马尼拉运往西属墨西哥,行销于美洲各地。

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就开始进口中国瓷器。1521年,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后,就有中国瓷器被辗转运到美洲大陆。此后,英国、荷兰的移民,也不断输入中国瓷器。据美国考古发现,在

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 26 英里处, 当年的西班牙传教区, 以及圣约翰斯河边印第安人贸易站旧址, 在弗吉尼亚英国移民居住区, 以及佐治亚州沿海岛屿圣西门岛, 太平洋沿岸加利福尼亚的德雷克湾地区, 都发现了美国独立战争前输入的中国瓷器碎片,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晚明青花、五彩和斗彩瓷。除了这些瓷器碎片外, 还有诸如财产清单、遗嘱以及报纸上的广告等文字资料, 提供了早期流行于北美大陆的中国瓷器线索。例如, 从 1668~1670 年担任纽约市长的科尼利斯·斯廷威科的遗产中有 19 件中国瓷盘。1696 年, 长岛一位荷兰新教牧师的遗孀玛格蕾塔·范瓦里科有各式中国瓷器 126 件。殖民地时期, 另一个有大量中国瓷器进口的主要地方是新英格兰, 这一殖民地是在 1620 年由英国清教徒所建, 到 18 世纪初, 由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往美洲殖民地贩运东方货物的增多, 中国瓷器开始大量输入^⑦。

美国独立后, 迅速组建东印度公司加入到对中国的贸易中来。1784 年 8 月 25 日, 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在格林船长指挥下从纽约首航到中国广州, 并于 12 月 27 日满载中国货物返航, 其中包括瓷器 962 担。该船于 1786 年再度远航广州, 又运走了大量瓷器, 包括青花瓷、瓷塑观音像、瓷塔等。此后, 中国瓷器成为美国进口的主要中国商品, 源源不断被运到美国, 当时经营中国瓷器进口的主要港口有塞勒姆、波士顿、普罗维登斯、纽约和费城, 其中, 尤以纽约最著名, 是美国销售中国瓷器的集散中心^⑧。纽约苏瑞记公司是经营景德镇瓷器的最大商行, 每年销售额约 10 万元^⑨。据不完全统计, 从 1784~1833 年间, 约有 1040 艘美船到中国贸易^⑩, 1834~1846 年每年亦有 30~40 艘美船来华。这一时期的中美贸易主要在广州进行, 直航贸易后很快在广州开设了商馆。

中美瓷器贸易虽然比欧洲各国晚, 但其华瓷的进口量迅速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在 1817~1818 贸易季, Caledonia 号从广州向美国贩运了数量惊人的瓷器, 仅商人 Robert Waln, John C. 和 William H. Smith 在这批货中就买到 3000 箱瓷器^⑪。费城的瓷器商人沃尔恩在 1820 年曾对美国广泛使用中国瓷器的情况, 作了生动的描述: “中国瓷器迄今已取代了英国的器皿, 高、中阶层人士无不使用, 甚至最贫困的家庭也能夸耀他们经过一番劳作而买到的几件中国瓷器。当今的姑娘出嫁, 几乎很少有不能

陪送中国茶具的。”^⑫

总之, 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 “华瓷冠绝全球, 而华人初不知其可宝, 殆真所谓圣不自圣, 民无能名者也。列强交通, 东西角胜, 而吾华独占最优之名誉。于是欧美斐澳, 恐后争先, 一金之值, 腾涌千百。茗瓯酒盏, 叹为不世之珍, 尺瓶寸盂, 视为无上之品。且又为之辨别妍媸, 区分色目, 探赜索隐, 造精诣微, 缸红苹绿, 则析及豪芒, 御窑客货, 则严其等第。”^⑬

四、外销瓷品种

早期进入欧洲市场的精美中国瓷器, 由于浓厚的东方气息使欧洲人耳目一新, 成为人们象征自己身份、地位的奢侈品和观赏品, 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流传到欧洲的瓷器数量稀少且价格高昂, 另一方面也说明过于纯粹的东方形制使瓷器脱离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需要。比如中国餐具的式样很少, 不能适应欧洲人饮食习惯和多样化餐具的需要, 中式瓷碟在欧洲的餐桌上只能用来放糕点, 把瓷质笔筒作为冰酒器, 把瓷质鱼缸用作花盆, 被限制了用途的瓷器, 其市场销路也必然受到限制^⑭。“在中世纪后期, 欧洲就已开始从中国进口瓷器, 但是直到 16 世纪后期确定了与欧洲的外贸发展关系之后, 中国作坊才开始仿效欧洲陶瓷的装饰风格和形状, 专门为欧洲市场生产瓷器。”^⑮

明末清初是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市场的繁盛时期, 此时也是中国瓷器制造业达到巅峰的时代, 不仅在工艺水平和器物造型上是空前绝后的, 在外销上也采取了较为灵活的运作方式, 除了成品订货外, 还有来样加工, 器物尺寸、形状和图案在合同中都有明确规定, 景德镇工匠只要严格按照要求照样制作就可以。为了让景德镇制造出符合自己要求的器物, 欧洲商人往往提供彩色画稿或模型, 模型有陶瓷器、玻璃器、银器、锡器及木器等^⑯。还有些是在景德镇烧好素瓷胎后运到广州再加彩, 即所谓广彩, 或运到欧洲后再加彩, 总之是根据欧洲



图九 清乾隆粉彩花卉纹冰酒器, 原本是中国笔筒, 销售到欧洲后, 德国人加上银质双耳和银箍, 改造成冰酒器



图一〇 清乾隆青花欧式花卉纹汤盆,器型、装饰纹样都是德国迈森瓷流行的样式,可能是景德镇根据欧洲人提供的模子仿制的产品



图一一 清青花欧洲加彩仕女纹盖罐,原本是清康熙时期景德镇窑制作的一件青花仕女纹盖罐,销售到欧洲后,主人根据自己的审美习惯,请专业加彩作坊加上了釉上黄、红、绿、金等色彩,把一件淡雅的青花瓷器变成了一件华丽的彩瓷



图一二 清雍正广彩人物纹啤酒杯,这种器型是中国传统瓷器中所没有的,原本是土耳其出产的一种陶质把杯,欧洲人把它改造成啤酒杯

市场的需求来设计、制作。输往欧洲的外销瓷中,有些造型是国内罕见的,如带柄的杯、罐、碗类的器皿、船形或头盔形的调味瓶、咖啡壶和啤酒杯,按欧洲模型制作的鹅、鸭、鱼之类动物形器皿,等等,都是专门为国外市场特制。

欧洲各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开发中国瓷器贸易的潜力,使之更适合欧洲市场的需要,逐步把中国瓷器的基本式样和装饰花纹改造成西方式样。如荷兰东印度公司1635年要求按欧洲式样的3种尺寸订做中国瓷器;1734年11月12日通知巴达维亚,准备寄一些烧得好的瓷器式样,以在中国依照生产等等。当时在荷兰和英国,中国瓷器主要是作为生活用具,这就决定它们必须适应欧洲的生活习惯,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所谓的“中国形”(Chinese Imari)瓷器,即融合西方式样的中国瓷器^⑧。明清时期中

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对当时东西方的瓷器生产都曾起到积极作用,正如美国学者科比勒(C.Le Corbeiller)在《中国贸易瓷器》一书中写道:“如此众多的瓷器满足了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兴趣,它深深地影响到荷兰、德国和英国瓷器制造的风格,但是,更重要的是买主有目的地特别订制的瓷器,发展了东西方的联系,即使是完全由西方人提供的设计亦常常下意识地表现出中国风格的影响^⑨。”

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多次应邀在欧洲荷兰、比利时、葡萄牙、法国等国家进行工作访问,参观了里斯本古典艺术国家博物馆、海牙博物馆、布鲁塞尔中国宫、集美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大维德基金会等众多收藏中国瓷器丰富的博物馆,据他观察,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造型比较丰富,有中国传统样式与外国样式。中国传统样式有各式瓶、壶、罐、碗、盘、杯等,象首军持、提梁壶、葫芦瓶、筒瓶、罐、炉、笔筒等也是明代晚期至清初常见的器形。外销瓷中以康熙时期的器形最为丰富,常见的棒槌瓶、凤尾瓶、锥把瓶、方瓶、梅瓶、葫芦瓶、将军罐、莲子罐、平顶盖罐、鼓式狮钮盖罐、花觚、盖缸、双耳盖缸、花口碗等,乾隆时期有茶壶、绣墩、成套餐具、带盖六方瓶、将军罐、盘、碗、人物雕塑和洋狗等。不少器形在中国传统式样的基础上,加入西方所喜爱的因素,创烧出具有新意的造型,比如,将军罐、瓶、莲子罐等器形明显比传统式样高,瓶口有多种变化,有渣斗式口、杯口,还有加双耳的,双耳杯、双耳盖杯、双耳盖缸、双耳盖碗,加双柄的有双柄盖瓶,还有把器形加以装饰和改造的,把瓶、樽等改作水器、灯具或在口、流、柄等部位加饰金属双柄、盖、链子等饰件(如展品第 号)。具有完全欧洲风格器物造型的有杯、汤盆、剃须盘、执壶、单柄壶、双口瓶等。奶杯,有大小数种,明代晚期出现,清代更为流行,有直筒式、直筒束腰式,有的一侧口部带流,多带有手柄。另一种高脚带柄杯,口部曲线有变化,有



图一三 青花竹石花卉纹剃须盘,这种器型是中国传统瓷器中所没有的,是欧洲人剃胡子时用于承接胡须的盘子,应该是根据欧洲人提供的模子仿制的产品



图一四

一件室内陈设品，到达欧洲后，把它改造成成了一个台灯座
清绿地粉彩四季花鸟纹琮式瓶，在中国是



图一五

件容器，加了银质盖子和链子
内陈设品，到达欧洲后，把它改造成了一室件容器

特别设计。比如在新航路开辟以前，中国瓷器的销售市场主要在亚洲，东亚、东南亚受中国文化影响深，基本上是中国内地风格的产品；而南亚和西亚，尤其是伊斯兰地区，青花瓷常以阿拉伯式的图案、风格化的枝叶、阿拉伯文《古兰经》短语和波斯铭文装饰。1516年，葡萄牙人到达中国以后，景德镇制作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葡萄牙铭文；17世纪，荷兰铭文又因中、荷通商出现在当时的外销瓷器上，此后，法文、德文、英文等西方文字也相继出现。

的还配有托盘，类似今天西餐用于盛放汁料的器皿。汤盆也是欧洲人喜爱的餐具，式样较多，有椭圆形、长方倭角形、六方形、花瓣形、菊瓣式多种样式，多数配有盖。执壶造型似锥形，下广上窄，顶部有盖，很别致^⑧。

从目前各地所能见到的明清时期中国景德镇外销瓷器来看，装饰纹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虽然为国外市场专门制作，但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样

现。这些都是按照欧洲商人的要求、适合欧洲消费者口味而特别绘制，大部分是严格依照顾客所提供的版画及图样来绘制，通常称为“订烧瓷”。17世纪以来，欧洲诸国通过它们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输入西方市场的货品如茶、丝和瓷器，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向往。这种对远方充满魅力的中国所产生的幻想，迅即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发展成为对中国事物的热潮。在18世纪，这种对“中国风格”的狂热达至巅峰，使遥远的中国大受影响，开始制作专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特色之一是其型制迎合西方人士的需求，其纹饰则是源自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景物，或是渗揉了欧洲人品味的“订烧中国瓷”纹样^⑨。这类瓷器品种丰富，个性鲜明，但数量并不大。在当时，“订烧瓷”的运作程序，一般是欧洲商人每年八、九月到达广州后，把物品模本、画稿与定金一并交给中国十三行的买办，通过买办把订单送到景德镇，第二年再从买办处取回上一个贸易季的订烧瓷^⑩。由于“订烧瓷”成本较高，占用资金时间长，手续复杂，商业风险大，不可能成为当时



图一六 清康熙景德镇窑青花开光花鸟纹盘，即所谓的克拉克瓷，是明万历至清初景德镇窑专门为外销而生产的瓷器品种，在欧美的博物馆中经常能见到

式，或虽然器物造型有欧洲特点，但装饰题材仍然为中国风格的花鸟、人物和山水等，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情调，此类产品占绝大多数，成套器具往往绘有相同的纹样。有时，在同一器物上也出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艺术的混合现象。比如有的瓷盘，中部主图为西洋社会生活场面，边框则衬以中国式图案；有的瓷器上的航海图，描绘了大航海时代中国和欧洲两种不同式样的大型远洋船舶风帆竞张、桅旌高扬的远航场面。

另一类瓷器，装饰纹样按照销售国家的需要而



图一七 清粉彩持伞仕女纹盘，该图案由荷兰画家科尼利厄斯·普龙克特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设计，1734年左右被发往中国



图一八 清乾隆墨彩矾红欧式人物纹奶壶，造型、装饰风格都是欧洲式样，成套器具一般包括杯、碟、糖罐等

外销瓷的主流产品，大多数“订烧瓷”是用作私人交易，有些则是商人及船员们作为纪念品或礼物。“订烧瓷”的装饰题材有西洋人物、肖像画、花卉、城市港口、田园风景、贵族生活、希腊罗马神话、历史传说、圣经故事、德国式纹样以及标示家族的徽章，也有欧洲设计师特别设计的式样。

在16~18世纪欧美各国的订烧瓷中有一类被人们称为纹章瓷的瓷器比较特别，在器物的显眼部位绘有欧美一些国家的贵族、显赫家族、都市、公司、军团、团体等特有的标志，与当时欧美各国流行使用纹章有关。一个完整的纹章包括冠、头盔、披风、盾牌、托器以及写有铭词的绶带，其中冠是等级的标志，英国以不同的冠代表公、侯、伯、子、男各等级爵位。盾牌按持有者意愿而定，盾形纹的纹地有蓝、红、黑、绿、紫5种颜色。纹章图记有神鸟、神兽、龙、鹰、犬、鱼、狮子等，以狮子最为常见。纹章瓷始于16世纪，盛行于18世纪，据文献记载，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市场的各类纹章瓷约60万件，其中1722年运到英国的40万件瓷器中多数为纹章瓷。据瑞典学者统计，曾有300多个欧洲家族到中国订制过纹章瓷。早期的纹章瓷多用青花，纹章画在器物中央，图案很大；晚期多用五彩和粉彩，图案缩小，常置于器物边缘。18世纪中期，纹章瓷形成了巴洛克式、罗可可式和新古典主义式等几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式追求奢华的外表，讲究对称，在当时颇受欢迎；罗可可式图案不对称，风格淡雅、洗练，



图一九 清雍正广彩纹章盘，造型是中国传统样式，盘心绘纹章，盘沿饰迈森瓷上流行的卷草纹

形式活泼，新古典主义式构图简单，图案对称，常为铲形或椭圆形，1780~1800年间风行一时^⑨。纹章瓷都是按订户的要求特别制作，大致可划分为名人徽章、省城徽章、机构或公司徽章、军队徽章等，名人徽章中既有国王、皇后，也有名门望族或知名人士订烧的瓷器，比如葡萄牙国王马努埃尔一世、佩德罗三世，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五世，普鲁士皇帝菲特烈二世，俄国彼得大帝，澳大利亚查尔斯六世及女王多纳·玛利亚等，尤其还有清嘉庆皇帝为庆祝葡萄牙国王约翰六世的加冕典礼赠送的绘有该国王徽章的五彩盘，可见当时纹章瓷的等级之高，流行之广^⑩。

至19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建立的制瓷工厂已成功烧制出适合本国市场的硬质日用瓷，对华瓷的需求迅速下降，正如长期在澳门生活的瑞典籍神父龙思泰(1759~1835)所说：“这种货物现在出口很少。当东方产品最初绕过好望角被运往欧洲时，中国瓷器价格很高，船运靠它获得巨额利润。但它的制造方法已被查明，欧洲国家开始制造，并很快与中国瓷器展开竞争^⑪”。欧洲瓷器还打进国际市场，在美洲、中东、北非都有欧瓷出售。英国的 Wedgwood, Worcester, Staffordshire 瓷厂，法国的 Sevres, Limoges 瓷厂都向美国出口瓷器，1810年英国从瓷器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自唐代起，中国瓷器就举世瞩目，成为重要的贸易产品之一。明清时期，欧美各国兴起一股强劲的“中国风”，视中国瓷器为珍宝，各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纷纷满载白银前来中国贩运瓷器以满足当地旺盛的社会需求，从而使得欧洲成为景德镇瓷器的最大海外市场。景德镇瓷器生产在巨大的海外需求刺激下至康乾盛世时期达于巅峰，生产方式灵活，产品丰富，装饰新奇，克拉克瓷、伊万里瓷、纹章瓷、洋器等在造型和装饰上广泛吸收国外的文化因素，相当一部分是严格按照客户提供的样品或设计图制作，专门为外销而生产。因此，景德镇明清景德镇瓷器具有真正的世界意义。

注释：

1492年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西班牙哥伦布船队，只有90名水手，3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只有250吨，仅为郑和宝船的1/10。1497年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葡萄牙达·迦马船队，只有160人，4艘小帆船，旗舰仅120吨，不到郑和宝船的1/20。1519年完成环球航行的西班牙麦哲伦船队也只有265人，5艘小帆船，其中2艘130吨，2艘90吨，1艘60吨，加起来总吨位也不过是郑和宝船的1/5。参考孙光圻等：《郑和下西洋——世界航海史上

的不朽丰碑》，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第155~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庄景辉：《郑和下西洋是什么》，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第162~1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费信：《星槎胜览·序》。

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

陈廷杭：《郑和宝船的工程解读》，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第181~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王冠倬：《郑和一号宝船综议》，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第187~1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孙光圻等：《郑和下西洋——世界航海史上的不朽丰碑》，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筹备领导小组等编《云帆万里照重洋——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第155~1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费信：《星槎胜览·苏门答刺国》。

⑪ 陈炎：《郑和下西洋促使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第166~1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⑫ 王忬：《条处海防事宜仰祈速赐施行疏》，《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

⑬ 张时彻：《招宝山重建宁波府知府凤峰沈公祠碑》，《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三）。

⑭ 冯璋：《通番舶议》，《明经世文编》（卷二八〇）。

⑮ 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

⑯ 霍与瑕：《上潘大巡广州事宜》，《明经世文编》（卷三六八）。

⑰ 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

⑱ 《明史》（卷八一），《食货·市舶》。

⑲ 谢清高著、冯承钧注：《海录》卷上，中华书局，1995年。

⑳ 《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㉑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九六）。

㉒ 杨国桢：《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㉓ 陈娟英：《试论17世纪郑氏海上贸易对闽台社会经济的影响》，《南方文物》2005年第3期。

㉔ 施琅：《靖海纪事》（卷下），《海疆底定疏》。

㉕ 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第9~2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㉖ 朱纨：《暨余杂集》（卷三），《双屿填港工完事》，转引自杨国桢《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

㉗ 叶文程：《宋元时期龙泉青瓷的外销及有关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7年第2期。

㉘ 章潢：《图书编》（卷五），《日本国》。

㉙ （韩国）尹武炳：《新安古沉船之航路及有关问题》，《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一辑。

㉚ 唐枢：《木钟台全集·冀越通》。

㉛ 《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

㉜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番》。

㉝ 《清圣祖康熙实录》（卷一一六）。

㉞ （英）G·D·克鲁士、何高济译：《中国志》，C·R·博克舍编《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第89页，中华书局，1990年。

㉟ ⑤⑥、⑤⑨、⑥① 钱江：《十七至十八世纪中国与荷兰的瓷器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89年第1期。

③⑥ 江澹河：《清代广州外销画中的瓷器烧造图研究——以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收藏为例》，《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3期。

③⑦ 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等：《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第18~19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⑧ 杨仁飞：《明清之际澳门海上丝路贸易述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

③⑨、④③、④⑨、⑥④ 孙锦泉：《华瓷运销欧洲的途径、方式及其特征》，《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④⑩ 《东华续录》（卷四十六），《乾隆朝》。

④⑪ 《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七）《市易五》记载：“时王大臣等言，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无论满汉人等，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允行。”

④⑫、⑥⑤、⑥⑥、⑦⑦、⑦⑧ 林琳：《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瓷器贸易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④⑬、④⑭ 翁舒韵：《明清广东瓷器外销研究（1511~1842）》，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④⑮、⑤① 严建强：《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第52页，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

④⑯、⑥⑥、⑦① 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④⑰ 王莉英：《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2期。

④⑱、⑤②、⑤③ 金国平、吴志良：《流散于葡萄牙的中国明清瓷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3期。

⑤①、陈炎：《澳门港在近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第179~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④、袁宣萍：《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设计》，第30~31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⑤⑤ 戈登：《收集中国外销瓷》，转引自夏鼐《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⑤⑦ （法）伯德莱著、耿升译：《清官洋画家》，第187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⑤⑧ 在海牙博物馆保存的东印度公司的记录里找到了唯一的画样原件，是1758年的，一共7页，保存了33件瓷器的图样，参考万钧《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外销》，《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4期。

（下转第188页）

的丧葬方面的信息,如下葬的时间、方位,为研究明代的丧葬礼俗提供了信息。王善缘被安葬在江宁县安德乡的上窑村,江宁县安德乡常常出现在明代的墓志铭中,此地出土的墓志铭规制统一,工艺比较成熟,可见是明代南京地区丧葬业较为发达的区域。根据《万历江宁县志》记载可知,明应天府江宁县安德乡上窑村大约就在今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一带^⑥。

此志还涉及一个人物即镌刻者“金陵朱信”,明代活跃在南京的朱姓刻工很多,对他们的师承和家庭关系虽很难考证,但是朱姓刻工的大量出现可能和朱姓王朝在南京的建立有关。

总之,尽管本《志》中涉及人物的具体情况及与时代的契合情况都还有很多待解之谜,但这篇墓志为研究欧阳氏家族等明代高级武将家族提供了生动、新鲜的材料,从中不难看出,明代上层武将家族面对交谊、婚姻和教育方面的多重选择。对王善缘的记录,虽然有作为墓志铭不可避免的溢美之词,但是她的言行折射了上层武将家族女性家长的责任和思想,从另一层面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故本《志》是研究明代军事家族和女性生活的珍贵材料。

注释:

此《志》现藏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物管理所。

此二字为墓志铭本身的空缺。

《江南通志》(卷121),(卷163)。希文为其字。

《江南通志》(卷163),《千顷堂书目》(卷19)及《万姓统谱》(卷33)皆从此说。

徐有贞《武功集》(卷5)。

如倪谦《倪文僖集》(卷29)有《中都留守司正留守徐公墓志铭》为陶元素所述行实来请;又卷18有《冶亭登高诗序》记陶元素等二十八人登高赋诗事。

《陕西通志》(卷33)。

如见何孟春《应诏陈言书》,即提及袭用的弊端。见《御选明臣奏议》(卷9)。

(明)周诗、李登纂修《万历重修江宁县志》卷三《版籍·乡图》载,“安德乡……在县西南三十里。”……以今方位及距离推测,明代安德乡主要范围应在今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区域。

(责任编辑:刘慧中)

(上接第94页)

⑥ D·W·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1961, The Hague, p. 62, 转引自李金明:《明代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外关系史论丛——关于我国历史上的开放与闭关政策专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⑥③、⑥④ (荷)乔克:《简介》,香港艺术馆编《中国外销瓷——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藏品展》,第36~41页,香港市政局,1989年。

⑥⑦ 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⑥⑨ 朱杰勤:《十七、八世纪华瓷传入欧洲的经过及其相互影响》,《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⑥② 纪炜:《域外生辉——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故宫博物院编《瑞典收藏的中国瓷器》,第130~131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⑥③ (瑞典)雅伟·万斯维克:《瑞典藏中国外销瓷》,故宫博物院编《瑞典藏中国陶瓷》,第56~65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⑥⑤ (法)伯德莱著、耿升译:《清宫洋画家》,第13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

⑥⑥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第47页,中华书局,2004年。

⑥⑦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eraire, 1785. 转引自阎宗临《中西交通史》,第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⑧ 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第946~951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

⑥⑨、⑥⑩、⑥⑪ 吴建雍:《清代外销瓷与早期中美贸易》,《北

京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⑥⑫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九,《景瓷销售》。

⑥⑬ 袁钟仁:《广州和美国的早期贸易》,《岭南文史》1999年第1期。

⑥⑭ 陈浏:《陶雅》卷上。

⑥⑮ 伊瓦·斯托贝:《德雷斯頓的中国瓷器收藏》,《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4期。

⑥⑯ (英)马丁·坎普主编、余君珉译:《牛津西方艺术史》,第294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⑥⑰ 香港艺术馆编:《中国外销瓷——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藏品展》,第46页,香港市政局,1989年。

⑥⑱ T·Volker, The Japanese Porcelain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fter 1683, p.55~56, Leiden, 1959. 转引自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⑥⑲ Le Corbeiller, China Trade Porcelain, p. 7, New York, 1973. 转引自李金明:《明清时期中国瓷器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⑥⑳、㉑ 冯小琦:《欧洲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国古陶瓷学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35~45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㉒ 柯馨德:《布鲁塞尔中国亭及其珍藏》,香港艺术馆编《中国外销瓷——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藏品展》,第22~27页,香港市政局,1989年。

㉓ 董健丽:《十八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紫禁城》1996年第4期。

㉔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郭德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第340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